

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力作

——简评李守庸教授的《寸心集》

杨小岩

1961年国庆刚过,李守庸同志受命参加教育部刚刚下发的经济系教学计划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古代部分的教学任务。当时,国内还没有出过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著,就是专题研究的论文也几乎没有。李守庸同志从零开始艰苦耕耘四十余年,不仅圆满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教学任务,而且撰写出了一系列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的学术论文,填补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系统研究的空白。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寸心集》就是从这一系列学术论文中选编而成,以时间为经、以内容为纬,囊括对中国古代思想家个人的经济思想的探讨、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专门问题的分析和有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三大部分,所选论文皆饱含了作者的心血,汇集成为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力作。

一、采珠集锦,精益求精

中国古代思想资料浩如烟海,而经济思想恰如散落在茫茫大海中的璀璨珍珠,虽然各自光彩夺目,但未曾有人系统采撷。李守庸同志受命研究此领域后,穷经皓首,上讫四书五经、下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有关典籍,从中搜索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关的文献资料,采珠集锦,编成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古代部分的讲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选编》,后被教育部指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同时还撰写出了《关于孔子经济思想方面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孟轲对孔子义利观中积极因素的继承与发展》《略论司马迁的若干重要经济观点》《略论东汉王符的“爱日”思想》以及《略论王船山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等专题论文。其中,《关于孔子经济思想方面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的第二部分《关于孔子的“均”的经济思想的探讨》发表于1962年3月12日的《光明日报》“经济学专栏”。

《关于孔子的“均”的经济思想的探讨》具体分析了孔子所提出的“均”的主张,孔子反对在国与家之间因贪求而讨伐与兼并,在国与家之内则反对财富过分集中和剥削,进而孔子又提出了“惠”的思想,即主张节约和勤俭克己,这都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变革潮流的,是积极的。又如对孔子的“义利观”进行分析时指出,孔子主张增加财富,以满足民众的物质生活需要,主张当政者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对于那些主张重利轻义的思想,作者虽然是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消极乃至反动的,但也必须看到,持这种义利观的剥削阶级思想家往往也用他们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本阶级的统治者,要求他们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益于人民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应当说作者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正确的。

二、立论公允,评价精当

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济思想,李守庸同志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具体分析,不拔高,不贬低,实事求是、恰如其分。

一是对于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分析。李守庸同志在1961年撰写的《关于孔子经济思想方面的几个问题的探讨》中认为这是孔子对于不安于贫而求利的“人”的批评,这些人乃是“小人”。经过40年的深入探讨,在《孔子义利观的积极意义》(《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一文中,李守庸同志明确指出那种认为“君子才懂得义,小人只追求利”的解释是不准确的。李守庸同志分析说,孔子所指的君子与小人,可以作出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指有德者和无德者,一种则是指在位者和民众。如果作前一种理解,这句话似应解做有道德的人才懂得义,没有道德的人只懂得追求利,按这种理解就不能说只有君子才有德,小人一定就无德,也不能引申出义贵于利、义主利从的结论。如果做后一种解释,则可以理解为在位者应当而且必须懂得义,而民众一般都懂得如何追求利。必须指出孔子认为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正当的,应该受到鼓励,但这种追求必须受到一定的道德规范的制约,特别是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道德修养的君子 and 士,更应当

见利思义,而不应该见利忘义,追求那些不义之财。对于一般民众也是如此。可见孔子是从物质利益与道德规范的关系的高度来阐明他的义利观,而绝不能认为只有君子才懂得义,小人只懂得利的。李守庸同志的这种分析是细致、深刻、令人信服的。

二是对王船山经济思想的分析。李守庸同志经过深入研究,认为王船山经济思想中具有一定的近代启蒙特色。比如,在土地问题上,王船山以“有其力者制其地”为理论依据,批驳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教条,论证了土地民有,并设想保护和发展以自耕农民为主体的小土地所有制,提出了某些有利于实现这种理想的赋役政策主张。又如在商品货币问题上,王船山对商品货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商人在商品货币流通中的社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持肯定态度,对价值规律通过自由贸易而发挥作用,也有相当深刻的认识,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同时,李守庸同志对王船山经济思想中的那些维护旧的生产方式的保守观点也给予了恰如其分的批评。不因其长而避其短,也不因其短而不言其长,作者的这种治学态度是公允、严谨的,只有这样评论历史人物,才能得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结论。

三、纵横比照,视野开阔

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过程中,李守庸同志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研究范围内,而是纵横比照,把研究对象放在整个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源流中,与前人、并世以及西方其他思想家相比照,以衡量其见解的高低与长短,评价其贡献与局限,因而显得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比如他把孔子与柏拉图这两位伟大的哲人的经济思想加以对比。首先分析两者的相同之处:“君子不器”,孔子与柏拉图都主张作为统治者或后补统治者,不需要也不应当学习和掌握工农商之类的具体知识,而只应当学习和掌握治国治民的知识;孔子主张“富而后教”,让民众先富裕起来而后对他们进行教育,柏拉图同样也主张一个人有了钱之后,就应当讲道德。孔子和柏拉图都反对社会财富过分集中,反对两极分化:孔子曾提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著名观点,以及反对当政者的贪欲和对民众的过分割削,他还说,“贫而无怨难”,“好勇疾贫,乱也”;柏拉图则指出,在同一个城邦里若存在贫富两大对立集团,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柏拉图还认为如果一个人过分贫穷,就会“粗野,低劣”,并且“要求变革”,即意味着社会动乱,这与孔子“好勇疾贫,乱也”的说法几乎如出一辙。作者还对财富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上对比了孔子与柏拉图经济思想的相同与相似之处。

其次,作者还分析了孔子与柏拉图在经济思想上的不同。在如何对待人力资源,特别是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上,柏拉图是鄙视的。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认为统治者是贵金属,被统治者则是贱金属,统治者生来就适合统治别人,被统治者生来只适合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全都是有点低贱的”。而在《论语》一书中可以说几乎找不到孔子任何鄙视工农业劳动者的观点,他对带头参加农业劳动的大禹就表示过高度赞美。对于以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不仅未予鄙视,而且以其心目中极高的道德规范“仁”相期许。另外,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柏拉图主张的“理想国”中,统治集团的生活资料由被统治者——工人、农民和商人供给,他们不得有“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的任何私有财产。而孔子认为大同和小康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在全社会而不是某一集团中实现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一种财产公有制。因此,也不存在像柏拉图所说的一部分人供养另一部分人的现象。

作者不仅对于孔子与柏拉图经济思想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进行了对比研究,还从商品的价值表现中的共同关系、分工、交换、商业和商人、土地问题方面的见解以及分配理论和义利观上的异同等问题对孟轲与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进行了对比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发人深省,具有开创意义的。

在对比东西方伟大哲人的经济思想异同之处时,李守庸同志还紧密结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中提炼出有关当代中国企业家应当具备的品格与胆识。他认为,当代中国企业家能否应对具有兴衰存亡意义的国际机遇与挑战,在这种机遇与挑战中站稳脚跟并谋求发展,关键在于当代中国企业家自身要认真学习 and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多方面的现代化知识,除此之外,企业家从中外古今的哲人和思想家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也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作者特别强调要认真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提倡的以天下为己任、先义后利,敢于拼搏以及常怀忧患之心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见解都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应对当今世界金融危机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读完李守庸教授的《寸心集》掩卷沉思,感慨系之。他在八十以上高龄,出版这样一部专题深入、评述系统、史料翔实、持论有据的文集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该书字斟句酌,精选精编,堪称当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领域的扛鼎之作。

(责任编辑:路小静)